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A Dictionary of Huizhou Culture

徽州 文化大辞典



《徽州文化大辞典》编委会 编
三联书店·北京大学出版社



A Dictionary of Huizhou Culture

徽州 文化大辞典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徽州文化大辞典》编委会 编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徽州文化大辞典/《徽州文化大辞典》编委会编. —合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2015.12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ISBN 978-7-312-03890-7

I. 徽… II. 徽… III. 文化史—徽州地区—词典 IV. K295.4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6562号

责任编辑: 李雅清 项赟飏 李攀峰

封面设计: 敬人设计工作室

出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96号, 230026

<http://press.ustc.edu.cn>

印刷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880 mm × 1230 mm 1/16

印张 89.25

字数 3482千

版次 2015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680.00元

A Dictionary of Huizhou Culture

徽州
文化大辞典

《徽州文化大辞典》编委会

主 任：任泽锋 孔晓宏

副主任：周 勇 路海燕 周天伟 肖善武 吴建春

叶长荫 蔡建军 洪永平

成 员：杨永生 翟屯建 王世华 徐健玲 蒋红卫

汪义生 汪德宝 胡建斌 刘才林 黄建敏

汪 炜 郑清土 方满棠

《徽州文化大辞典》编写组

主 编：任泽锋

副主编：杨永生 翟屯建 王世华

成 员：洪玉良 吴清健 陈平民 郝延红 洪树林

陈爱中 陈 琪 陈 政 陈安生 姚存山

方光禄 郑建新 吴兆民 洪 璟 李 云

胡 灵 许 琦 吴建平 倪受兵 章锡辉

唐祖怀 邓根宝 汪顺生 储正茂 张银泉

舒铭华 施兰萍



梦外黄山

礼仪徽州

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前所未有的地位和作用,强调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站在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新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起点上,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按照“挖掘阐发、保护弘扬、传播推广、融合发展”的要求,自觉自信地肩负起保护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有力有效地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钟灵毓秀的黄山白岳,孕育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在哲学、经济、社会、教育、学术、文学、艺术、工艺、建筑、医学等几乎所有领域,徽州文化都神奇地展现了卓尔不凡的风采、散发出辉煌灿烂的光芒。比如新安理学、新安志学、新安医学、新安文学、新安画派、新安四宝,比如徽州商帮、徽派朴学、徽州教育、徽州科技、徽派建筑、徽派刻书、徽派版画、徽派篆刻、徽派盆景,比如徽剧、徽雕、徽菜等等,都是典型性与普遍性的完美结合,既有浓郁的地域气息和特色,又是那个时代主流文化最高水平的一个代表。作为儒家文化在中国民间社会最完整表现的范本、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后期文化最有价值的样本,徽州文化无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以徽州文化为根底,以中国历史文化第五大发现——百万件(册)徽州文书的面世研究为发轫,一门新学问——徽学应运而生、勃然而兴。

在推动徽学成为与敦煌学、藏学鼎足而三的显学进程中,徽州文化的持续深入全面辩证研究,始终是一个重大课题。纵览卷帙浩繁的徽学著述文献,先有分门别类“块状”介绍徽州文化最经典的二十种文化现象的《徽州文化全书》,后有条分缕析“条状”揭示徽州文化演变历程的《徽州文化史》,唯缺一本包罗万象“点状”阐释徽州文化元素的工具书。现在《徽州文化大辞典》的正式出版,适时填补了徽州文化研究的辞书空白。作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共黄山市委、市政府组织数十位专家学者,历时

近三年精心编写这部大辞典,以辞书的形式将徽州文化中的生态、宗族、徽商、文学、艺术、文物、饮食、人物、建筑、古迹遗存、学术宗教、教育科技、方言民俗等悉数表达,让人一册在手,随时查阅,既方便一般读者了解徽州文化的基本情况,又能为专家学者进一步探究提供线索,有着很高的实用价值,确实是一部系统展示徽州文化、体现徽学研究成果的百科全书,一本融资料性、学术性、通俗性于一体的优秀读物,可谓徽州文化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进一步把徽学真正打造成为一门适应国际学术发展潮流而成功走向世界的显学,是各界的热切期盼,也是学界的共同责任。希望徽学同仁求真务实、合力发力,把创新摆在核心位置,让视野面向开放空间,在更广阔的平台上不断推出更多有分量、立得住、打得响的研究成果。

是为序。

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曹征海

2015年12月23日

前言

徽州地处皖南山区,环绕四周的黄山、天目山、白际山、五龙山山脉,海拔均在1 000米以上,相对高度800米以上,将徽州与其他地区截然分开,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以黄山山脉为界,南坡有流向东南钱塘江流域的新安江水系,流向西南鄱阳湖流域的闽江水系、乐安江水系;北坡有直接流入长江的青弋江水系、秋浦河水系。清乾隆时著名诗人黄仲则诗曰:“一滩复一滩,一滩高十丈。三百六十滩,新安在天上。”此诗道出了徽州特殊的地理环境,其中所说的“新安”,即为高处钱塘江源头山地的徽州。

徽州历史悠久,文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四五万年以前新安江流域的智人时代,旧石器时期就已经有先民生活。而在新石器时期,这里的先民们已经创造了原始土著文化。西周时期,这里就有了最早的族国——闭。屯溪西郊奕棋村附近发现的西周至战国早期的墓葬,出土了一大批青铜器、陶器、原始瓷器、玉石件和漆器残件,说明当时这一带的文化已经相当发达。

秦始皇统一全国,在徽州境内设黟、歙二县。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十二月,孙权派遣威武中郎将贺齐出兵黟、歙,平定山越,将原黟、歙之地析为黟、歙、始新、新定、犁阳(后改为黎阳)、休阳六县,建新都郡,这是徽州州郡府一级行政设置的开始。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改新都郡为新安郡。隋开皇九年(589年),改新安郡为歙州。唐大历五年(770年),歙州辖歙、休宁、婺源、祁门、绩溪、黟六县,形成延续至清末达1 142年的“一府(州)六县”格局。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方腊起义被镇压,五月,改歙州为徽州。至清宣统三年(1911年),“徽州”二字一直没有变更,或称徽州路,或称徽州府。在长达790年的时间里,这六县一直稳定地隶属于徽州,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对徽州文化的形成、发展和繁荣起到极大的作用。

徽州文化指的就是古徽州府属六县(歙、休宁、婺源、祁门、绩溪、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是宋以后中国儒家文化在民间社会最完整的表现和最典型的代表。

徽州文化涉及哲学、经济、社会、教育、学术、文学、艺术、工艺、建筑、医学等诸多学科,凡与徽州社会历史发展有关的内容,都可以归纳入徽州文化的范畴。徽州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独树一帜,在各自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

中国思想史大概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其一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产生了一大批思想家;其二是西汉时期,董仲舒独尊儒术;其三是南宋时期,新儒学兴起;其四是清乾嘉时期,启蒙思想萌芽;其五是“五四”运动,近代思潮发端。其中南宋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朱熹是徽州婺源人,乾嘉启蒙思想的代表人物戴震是徽州休宁人,“五四”运动代表人物之一的胡适是徽州绩溪人。中国思想史的五个发展阶段,徽州人就在三个发展阶段占据了主要位置,由此可见一斑。

徽商在明朝中期至清道光年间,无论是经商人数量、活动范围、经营行业,还是商业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独领风骚300余年,为社会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新安理学是12世纪以后中国哲学史和学术思想史的缩影,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历史的发展,特别对明清时期徽州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另外,新安医学注重师承、家传,崇尚医德,追求德艺双馨,形成了一些学有所传、业有所精的医学世家,所主张的“固本培元”理论,是中国传统医学中的精华。文学艺术方面更是硕果累累,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宋以后,儒家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但儒家文化在不同阶层有不同的反映形式。在统治阶层有它的治国之策,在文人阶层有它的理论体系和文论、诗歌等表现载体,反映到民间社会则体现在老百姓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儒家文化的其他层面在全国其他地区都有,唯有在民间社会,只有徽州才是它最集中的表现区域和最典型的代表。

譬如,徽州三雕依附于徽州建筑而存在,建筑与人朝夕相伴,作为徽派建筑重要文化元素之一的徽州三雕,除了视觉审美愉悦以外,在宣传儒家思想方面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成为儒家文化教化的一种符号。儒家思想中的读书入仕、忠孝节义、中庸和谐等特征在徽州被演绎成一个个故事,定格成一幅幅三雕图画。这些作品在表现儒家文化的本质特征时,采取的是深入浅出的表现方式,而不是说教,取材也都是普通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戏曲唱本、文学典故、神话故事、名人轶事等等。手法含蓄,象征意味浓厚,所以也最容易被老百姓所接受、吸纳。其他如楹联、匾额、歌谣、民俗礼仪等等,莫不以儒家思想贯穿其中。徽州人从一生下来就生活在这样一种儒家思想的氛围之中,耳濡目染,每天都在进行精神陶冶浸淫。

徽州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晶,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

值,精神内涵深刻。

在“徽学”视域下,徽州文化属于大文化的范畴,凡与徽州社会历史发展有关的内容,都属于徽州文化,形成一个庞大的文化体系。这一文化体系的构成,建立在地理、社会、思想、经济四大基础之上。徽州地理是徽州文化形成的自然环境基础,徽州宗族是徽州文化形成的社会基础,新安理学是徽州文化形成的思想基础,徽商是徽州文化形成的经济基础。

徽州地处皖南山区,山多地少,俗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说法。境内峰峦挺秀,河溪环绕,宛如天然公园。黄山七十二峰矗立云间,峥嵘雄奇,气势磅礴,汇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四绝”为一体,雄奇幻险,变化无穷,移步换景,涉目成画,被世人誉为“人间仙境”。齐云山与黄山遥遥相望,融丹霞地貌、山水风光、道教文化、摩崖石刻、碑刻和恐龙遗迹化石于一体,是江南著名的道教活动中心。新安江有“山水画廊”之称,江流澄碧,水色如镜,像一条闪闪发亮的银链,穿行于锦峰秀岭、山乡古建筑之间,风光绮丽,娇柔妩媚。徽州的大自然美景历来受到人们的赞誉,半个多世纪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曾说过:“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和它相类,这个地方就是瑞士。”

地理环境是徽州文化产生的物质基础。新安画派的描绘对象就是徽州大好山水,而徽州山水对新安画派艺术特色的形成又具有对照作用。徽派建筑艺术同徽州的山水特征和地域美饰倾向结合得也很密切。徽州园林受徽州大好山水的影响,崇尚自然,就形造景,寓情于景。尤其徽州自然风光秀丽,处处是景,借景入园,全无人工雕饰的痕迹,是徽州园林的最大特色。众多的木、竹、石、砖资源为木、竹、石、砖雕刻艺术、竹编艺术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从经济角度看,山多田少,粮食收不敷食,又促进了徽州商业经济的发展。

徽州社会构成的主体,是徽州的士族。这些士族主要来源于北方,明朝以前可考的大姓有57个,主要有程、汪、吴、黄、胡、王、李、方、洪、余、鲍、戴、曹、江、孙15个大姓,号称“新安十五姓”。中原士族迁徽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封闭型的徽州地理环境,为躲避北方战乱的理想地方;二是外地来徽任职的官员,迷恋徽州的大好山水,留居不归;三是失意仕宦或贬谪文人,将闭塞、景美的徽州选作隐居之地。外来居民迁徽时间集中在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两晋之际,当时北方遭“永嘉之乱”,形成北方人口南徙的第一次高潮;第二阶段是唐朝,中唐的“安史之乱”与唐末的农民战争,使北方陷入动荡之中,因而出现了第二次北方人口南徙的高潮;第三阶段是两宋之际,当时正值北方“靖康之乱”。徽州外来士族主要来自中原,除了个别姓氏有不同的支派、从不同的地点迁入以外,大多数为同宗、同源派衍而出。这就给徽州这个比较独立而又较为封闭的地理单元形

成一种严密的宗族观念创造了条件。有谱、有祠、有田是南宋徽州宗族社会形成的标志,但徽州宗族社会形态在南宋时并不完备,修谱、建祠、置族产也不普遍。直到明嘉靖、万历时期,徽州宗族社会才真正成熟。

新安理学是程朱理学的重要分支,以徽州理学家为主干组成,奉祖籍徽州篁墩的程颢、程颐和祖籍徽州婺源朱熹为开山宗师,以维护继承、发扬光大程朱理学为基本宗旨。南宋是新安理学的形成时期,理学家们环护在朱熹周围,精研性理之学,著书立说,确立以朱子学为宗旨的基本原则。元朝是新安理学发展较快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针对朱熹之后“异说”纷起的学术界状况,致力于维护朱子之学的纯洁性,将排斥“异论”、发扬和阐明朱子学本旨作为学术研究的重心。同时,元朝新安理学家崇尚“气节”,不仕元朝,将精力集中于讲学授徒,培养了一批有一定建树和影响的新安理学者,出现了人才辈出、学术研究深化和普及读物大量出现等新气象。明朝是新安理学的极盛时期,主要代表人物在批评元朝理学家墨守门户、死抱师门成说之弊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了求“本领”、求“真知”、求“实理”的新治经主张,并据此指导思想进行学术研究,形成了或“旁注诸经”发扬和阐明朱子之学,或“和会朱陆”弘扬本门宗旨的不同学术风格。从学术研究的成就和特色来看,这是新安理学发展史上最丰富灿烂的时期之一。而新安理学所倡导的儒家思想也成为徽州人的行为指南。

徽州境内自然条件恶劣,生产技术低下,用力甚勤,所得甚寡。唐宋以后,随着人口的增多,开始出现粮食收不敷食的情况,70%的粮食仰赖江西和江苏、浙江供给。为了获得换取粮食的货币,徽州人充分利用当地山清水秀的自然地理特点,开展多种经营,植茶、造纸、制墨、制砚等,形成了徽州土特产丰富和手工业发达的经济特色。输出特产和手工业品,换回粮食。这种经常性的交换,使徽州人不断地积累从商经验。正是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徽商逐步成长起来。宋朝,随着大量土特产品和著名手工业产品的兴盛,商品交换日趋发达。徽纸远销四川,夺得当地蜀笺的市场。南宋建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大兴土木,使竹木和漆的市利百倍,更加刺激了徽州商业资本的发展。这一时期,在徽州人的生业中,经商已经开始占有位置,徽州经商风气兴起,为徽商的成长奠定了基础。元朝,徽州的商品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产生了不少大商人。徽商的崛起以明初盐业开中制为契机,以经营盐业为中心,开始雄飞于中国商界。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徽商最早的集团组织——歙县会馆在北京创设,标志着徽商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明朝中期至清道光年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是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还是商业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

宗族社会是在理学家们的倡导下形成的,修谱、建祠、置族产都需要钱,徽州大规模修谱、建祠、置族产与徽商的崛起同步,徽商是徽州宗族社会形成的经济保障。同时,徽州的理学家们提出“贾何负于儒”,又为徽商的崛起提供理论基础,为徽州人理直气壮地开展商业经营打开思想禁锢。同样,徽商以其充沛的资金,支持教育和学术研讨,为新安理学的繁荣和壮大提供帮助。宗族也以地缘和血缘关系为徽商的发展提供帮助。三大基础的形成和成熟以及三者完全融合,带动教育、学术、文学、艺术、工艺、建筑、医学、民俗等各方面发展,形成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派建筑、徽派版画、徽派篆刻、徽派朴学、徽剧、徽菜等学术艺术流派,使明清时期徽州文化进入一个光辉灿烂的时期。而徽州文化在各个领域取得的成绩,也都与地理、宗族、理学、徽商有关,深深打下这四个方面的烙印。

徽州文化的社会基础、思想基础和经济基础夯实以后,促进了徽州文化在五个方面的全面发展。

首先,教育普及,大大提高了徽州人的素质水平。人的素质提高主要依赖于教育的普及。北方士族迁入徽州,带来发达的中原文化,以教化乡里,礼授社会,习俗由此渐变。宋罗愿《新安志》载:“其人自昔特多以材力保捍乡土为称,其后浸有文士。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宋兴则名臣辈出。”南宋以后,一个重文重教的社会习俗已在徽州形成。重视教育成为徽州千百年来的传统。

教育普及的第一个成果是人的学问水平大大提高,科举兴旺,名人辈出。明清时期,根据地方志记载统计,明朝徽州有举人1 100余人,清朝徽州有举人1 536人。明朝徽州有进士452人,居全国第13位;清朝徽州有进士684人,居全国第4位。明朝徽州有状元3人。而清朝112科112名状元中,徽州本籍状元4人,寄籍状元15人,共19人,占全国的17%,居全国第1位(原被认为状元数最多的苏州府共有状元24人,但其中有6人为徽州人)。此外,歙县明清两朝共取进士623人,居安徽省诸府首位。徽州历史上人文荟萃,名人代出。《辞海》单列条目中,徽州人有51人,列全国各州府之首。《中国人名大辞典》收集清以前历代人物4万余人,徽州人就有747人(不含侨居外地的徽籍名人)。《中医大辞典》载有安徽籍名医118人,其中徽州84人,占71.2%。

教育普及的第二个成果是徽州人的劳动技能大大提高,百工之作皆备。徽州地处山区的自然环境,限制了人们单一从事农田耕作,不得不从农田以外去想办法。明嘉靖《徽州府志》就记载,为了从农田以外寻求生活出路,于是“百工之作皆备”。唐宋以来,与印刷业有关的造纸、制墨工艺一直很发达,砚雕和墨模制作技艺也已得到高度发展。到了明清时期,徽州刻工大量涌现,尤以汪、黄、仇、刘四姓最为突

出。歙县虬村黄氏一族,世代“剡劂”,从明天顺到清道光,近400年时间,称得上“剡劂世家”。黄氏一族世代刻书,积累了丰富的刻书经验,特别在插图雕版上,具有很高的造诣和精湛的技艺,对徽派版画艺术的贡献功不可没。一些绘画、篆刻名家,如丁云鹏、何震、郑昉、汪肇龙等,一度也是以绘画、篆刻作为自己谋生的手段,这对促进绘画和篆刻艺术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教育普及的第三个成果是徽州人的道德观念大大提高,百姓礼让,官吏廉洁。徽州人非常注重礼节,待人处事有长幼尊卑之分,尊上要行跪拜礼,坐不争上,食不争多,行不争先,称为“三不”礼节。与人交谈,书信往来,对人尊呼,对己谦称。见面互行拱手礼,互致问候。给客人端菜、送饭,用双手捧碗。登门作客或探望病人,一般都要赠送糕点食品。在古徽州历朝历代的杰出人物中,名臣廉吏辈不乏人。如绩溪一都人葛兴,明成化年间在山东济宁州当判官,三年下来,于民有惠政,百姓民谣争相传颂,鲁王特书“德政”匾旌表。后来巡抚都御史侣钟行访知其清廉,也写了一副联语相赠:“一官清似水,百姓重如山。”

其次,艺术繁荣,提高了徽州文化的影响力。徽剧对全国各个剧种都产生了影响,婺剧、赣剧、滇剧、粤剧、桂剧、淮剧等,都有徽剧的成分。清乾隆年间,四大徽班进京,徽剧又同汉剧等剧种结合,逐渐演变成中国的国剧——京剧,成就中国戏剧史上辉煌的一页。当徽州人提到徽剧与京剧的关系时,无不骄傲地说:“徽剧乃京剧之母。”新安画家以遗民苍凉孤傲之情,化作笔下的峻岭奇松、悬崖峭石、疏流寒柯。作品体现出一种超尘拔俗和凛若冰霜的气质,意境深邃,是明清文人画的正统继承者。徽派版画代表了中国传统版画的最高成就,著名学者郑振铎看精彩的徽派版画代表作《十竹斋笺谱》,大为赞叹,称其“实已跻彩色版画至高之界”。鲁迅也赞誉《十竹斋笺谱》是“明末清初士大夫清玩文化之最高成就”。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和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鲁迅与郑振铎两度联手翻刻此书,传为文坛佳话,由此可见《十竹斋笺谱》的魅力。同时,徽派版画所体现的套版印刷法,也是我国在世界印刷史上的第二大贡献。徽派篆刻贯穿整个中国文人篆刻史始终,而且在文人篆刻的每个发展阶段都有贡献,成为中国文人篆刻史上的主流派别。

其三,学术成果丰富,反映了徽州人的思辨能力。徽派朴学是清朝中国学术史上最重要的学术流派。徽州朴学家治学范围广博,具体课题窄而深。在治学方法上,善于提出规律性的问题,发前人所未发。求实求真,敢于突破前人旧说提出己见。以名物训诂通经义,以语义分析阐发哲学思想。徽州朴学家并不局限于考据范畴,戴震曾说:“六书、九数等事,如轿夫然,所以舁轿中人也。”又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

词,由词以通其道。”^①考据对于戴震来说只是手段,将文字训诂与名物制度作为名道的工具,阐发“义理”才是目的。戴震是徽派朴学的领袖,他在精严考据的基础上阐发义理,把对理学的批判与对封建特权的批判紧密地结合起来,建立起一套具有人道主义意义的人性理论。

史学领域,程瑶田运用传统史料同博物考古结合起来的治学方法,为近代考古学的建立开启了先河。经济学领域,王茂荫提出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钞票的理论,成为防止通货膨胀的先驱。王茂荫的主张虽然没有被清政府所采纳,但这件事被马克思所得悉,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编第三章的一个附注中专门提到这件事,使王茂荫成为《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中国人。

其四,科学技术成就显著,体现了徽州人的创新能力。新安医学是中医医学领域中的翘楚。南宋歙县张杲淳熙十六年(1189年)撰成《医说》10卷,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记载大量医学史料的书籍。明歙县江瓘的《名医类案》是我国第一部总结历代医案的专著。明祁门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大全》100卷与清歙县程杏轩的《医述》16卷同被列入中国十大古代医学著作。徐春甫于明隆庆二年(1568年)发起组织“一体堂仁宅医会”,是我国最早的医学学术团体。明歙县方有执撰《伤寒论条辨》8卷,首倡错简说,开医学一派之先河。新安医学注重师承、家传,形成了一些学有所传、业有所精的医学世家,所主张的“固本培元”理论是中国传统医学中的精髓。

程大位的《算法统宗》是中国珠算学的集大成之作,而戴震致力于弘扬祖国数学的历史成就,开古算研究之先河。汪莱则对数学理论本身做出了创造性的成果,他在方程论、组合论及二进制方面的研究,更是令世人瞩目。另外,在地理学、物理学、农学、生物学等方面,徽州都有很多贡献。

其五,经济与文化的提高,极大地丰富了徽州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人们尽量享受精美雅致的物质生活,注重人居环境的营造,强调饮食的可口美味,创造出了徽派建筑与徽菜两大居住与饮食流派。在村落建设上,或枕山傍水,或夹溪而筑,村子四周青山相峙,既得山泉溪水之便利,又有青山绿树为屏障。从宅院里推窗远眺,天然图画尽收眼底。天井洒落进阳光雨露,小院植置着花木假山。在这里,人类与大自然完全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宅居、祠堂、牌坊“古建筑三绝”,成为徽派建筑的象征。徽州三雕与建筑整体配合得极为严密稳妥,其布局之工、结构之巧、装饰之美、雕刻之精,令人叹为观止。对饮食的不断改进,促使了徽菜系的产生,成为与鲁菜、淮扬菜、川菜、粤菜、湘菜、闽菜、浙菜并峙的八大菜系之一。

^① 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M]//戴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83.

物质生活得到保障,随之而来的是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于是,民间娱乐大为盛行,穿插于生产生活礼仪、人生礼仪和岁时节日习俗之中,调节人们的精神生活。徽州民间娱乐风俗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多彩,洋溢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徽州人对戏曲的喜爱,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当村民犯了错时,一些惩罚手段也颇具文化色彩,如罚戏。谁犯了错,谁就得请戏班子来村里演出,所有的费用都由犯错者出。这样,既达到了惩罚的目的,又使全村的人得到了娱乐的欢愉。同时,业余时间的把玩与欣赏,也促使徽州民间收藏和徽派盆景大量涌现。

在徽州大地上,触目的都是徽州文化,但徽州文化是有层次的,犹如一棵大树,四大基础是文化之根,五个方面是文化之干,各项具体的表现或者说表象则是这棵文化之树的枝叶。

中国有句老话叫“以史为鉴”,只有认真研究一个文明的过去,才能真正了解这个文明,借鉴其中有益部分,为当代发展提供经验。同样,研究徽州文化,也有着现实意义。徽州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它的学术价值,一个是它的社会价值。

关于学术价值,首先是徽州文化为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农村社会实态提供了一个范本。徽州保存下5 000余处地面文物遗存、4 000余种文献、80余万件文书,跨越千年历史,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尤其是地面文物遗存、无形文化遗产和文书档案,均为第一手资料,是人们了解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农村社会实态不可多得的材料,为按历史本来面貌做综合实态研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周绍泉先生指出,将以徽州文书为代表的历史文书档案作为主要资料,综合研究历史社会实态,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潮流。

其次,徽州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徽州文化独树一帜,在各自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从徽州文化中提炼出来的徽州宗族、新安理学、徽商、徽派朴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派建筑、徽派版画、徽派篆刻、徽剧、徽菜是徽州文化中的精华,学术界在研究专业史时无法绕开这些课题。因此徽州学研究,实际也就是对中国封建后期传统文化的研究,窥一斑而见全豹,具有普遍的学术意义。

其三,徽州文化具有地理文化单元的人类文化学研究价值。徽州四面环山,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风景秀丽,人们的审美观自然受到山水环境的影响。徽州三雕艺术、文房四宝艺术、徽派盆景艺术、新安画派、徽派版画等,就是徽州自然环境同徽州人审美观相结合的产物,而新安医学、徽菜、徽州方言的形成,同徽州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及资源有关联,徽州宗族社会构成和村落结构,同徽州地理环境也有关系,具有地理文化单元的人类文化学研究价值。

其四,徽州文化具有研究文化融合规律的价值。徽州文化是一种移民文化,首先表现在徽州的社会、人口、文化的本身就是由移民而形成的,由此决定了其社会与文化的诸多现象和特点都由移民问题决定或受其影响。其次是徽州文化的昌盛与发展,本身还存在着一个由徽州本土再向外移民的问题,并对侨寓地的文化产生影响。如徽派朴学、徽剧、徽州园林艺术、徽州建筑艺术、徽派刻书、徽派篆刻、徽菜等对扬州学派、京剧、江南园林、中国版画、篆刻、菜系都有渗透和影响。研究徽州文化,可以获得中华大文化融合各民族文化、各地方文化的一般与个别规律,为繁荣中华大文化做出贡献。

关于社会价值,一是徽州文化中积极的思想因素,如徽州文化中的“和谐”内核和徽商精神(爱国精神、拼搏精神、学习精神、敬业精神、团队精神、奉献精神)值得借鉴。“和谐”思想已经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柱础。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体现的和谐思想更应该大力推广。

二是徽州文化中一些社会实践行之有效的做法值得借鉴。徽州是宗族社会,徽州农村基层全部都是依靠宗族自治管理,有不少好的做法。现存不少宗族公约中有值得令人学习和借鉴的条文,如禁止滥砍滥伐和禁止赌博等。从内容上看,它们符合我们今天所提倡的环境保护和社会文明,从实施机制上看,它不是依赖于行政系统,而是靠“公约”的形式自我约束。这给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带来启示。徽州文书中的商业合同,反映了徽州人市场观念的成熟;分家契约,反映了徽州人既遵从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又理性地处理家庭财产等经济问题;诉讼文书,反映了古代徽州民间已经有较强的法制观念。徽州古村落人与自然和谐,一切以人为本的思想贯穿村落建设。村落中的防火措施、水系设计都十分讲究,科学性很强,对我们进行环境规划设计有着重要的启示。

三是徽商的成功是经济与文化互动的结果,是文化软实力的成功,徽州教育的发达,为徽商发展提供了具有优势的人力资本。这也是当前经济发展中最值得注重的发展模式。徽州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随着计算机普及、互联网开通,中国已融入世界,西方文化不断侵蚀和占领中国市场,一些年轻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失去兴趣。在这种时候,弘扬和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显得重要,而徽州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很多方面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对徽州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弘扬其精华,就是使中国传统文化能“永远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四是徽州文化的众多遗存,成为把黄山市建成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丰富资源,对徽州文化进行深入研究,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一资源。黄山市以旅游、文化、生态立市。一个人口不多的地级市,有一处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一处世界文化遗产,世所罕见,这不能不说是徽州文化

的功绩。对徽州文化进行研究,有助于高水平、高质量地向世界推介徽州文化,把徽州文化转化成宝贵的旅游资源,促进黄山市旅游经济的发展。

徽州文化博大精深,学术研究不断深入,有不少很有见地的徽学著作问世。编撰《徽州文化大辞典》,以期填补全面涵盖徽州文化元素的辞书空白,力求科学、全面、准确、系统展示徽州文化的各个方面,使之成为一部丰富翔实的徽州文化百科全书,对于徽州文化学术研究和普及传播来说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